

浩然 站不住的家

J I A B U C H U Q U D E S H A Y A T O U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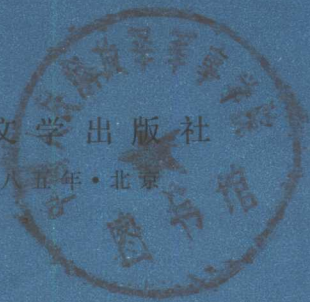
2 034 9291 5

嫁不出去的傻丫头

浩然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

责任编辑：江达飞
封面设计：于绍文

嫁不出去的傻丫头

Jia Bu Chuqu De Sha Yatou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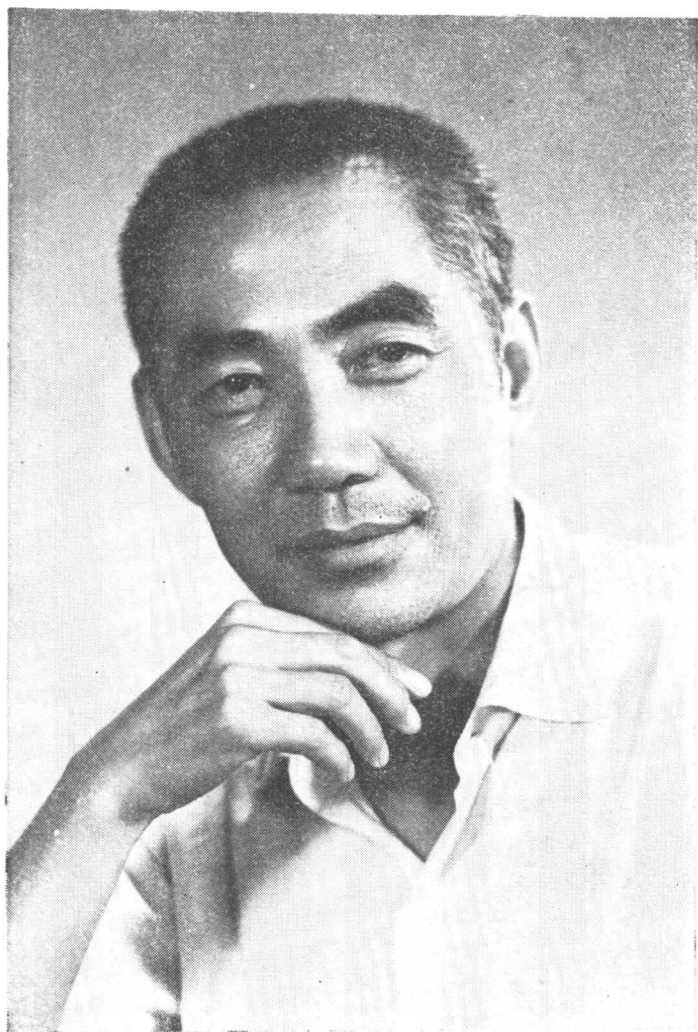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416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8\frac{9}{16}$ 插页 8

198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5,500

书号 10019·3881 定价 3.55 元



作 者 像

追赶者的几句话

作家一辈子都难得消闲和宁静。他们总是个忙忙碌碌的追赶者。有的作家象驰骋的骏马；有的作家象奔跑的汽车；有的更快，好似飞机，直腾于云端！

我象什么呢？比作骆驼，我没有那么庞大，没有那种力气；而且，我没有走过那样长的荒凉沙漠。我一直在田野间，走、走、走！

应该说我一头牛，是一头个儿不大的牛，拖着一辆笨重的木头轱辘的车赶路。

不管是“骏马”式的，还是“汽车”、“飞机”式的，抑或是我等个儿不大的“牛”式的，凡是真正的作家，而不属于戴着作家头衔的政客、投机商和“混子”，他们在赶路的时候，都无一例外地有着自己的明确、崇高的追求目标：达到一定的目的地，再在前方树立起一个标志，继续地追赶。所以他们才肯于自寻其苦地不能消闲、不能宁静；尤其顾不上搁下艺术的探求，去另搞什么利益钻营和勾心斗角。

尽管我不是曾经“耕犁千亩实千箱”的有功之牛，亦未到“不辞羸病卧残阳”（引自宋代李纲诗）的境地，我仍是一头有事业心、有追求的“牛”，艰辛地、奋力地赶了三十多年坎坷曲折，同时也伴随着短暂的快乐和转瞬即逝的满足的路。

我的创作之路，如若大体上划分几个阶段的话，那么，似乎

是这样的：开始的一段写短篇小说，以后来编选出版的《春歌集》和《花朵集》为标记；继而写多卷本长篇小说，就是写《艳阳天》和《金光大道》的那一段；接着，我踏上另一个阶段的追赶路程，集中精力写“小长篇”和中篇小说，已经发表的《山水情》、《晚霞在燃烧》、《乡俗三部曲》，加上这本中篇小说集子，便是其成果。

为使这个集子的厚度适宜出版要求，《弯弯的月亮河》、《高高的黄花岭》和《战士小胡》没被我选进来。连同它们，这几年里，我总共写了十部中篇小说。由于我写的《嫁不出去的傻丫头》中的主人公具有一股子牛脾气，我本身总是摆脱不掉一点儿傻气，于是乎，就给这个集子拟了个不太时髦、缺乏洋味儿的呆笨的名字。

拿这本集子里的作品，跟我从前几个阶段写的作品比较，并非仅仅是形式的长短不同。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作品的思想、生活和艺术内容。在创作道路上的第一个阶段，我虽然爱上文学，并热衷于搞起文学，实际上却不太懂文学；初学乍练，艺术表现力和认识生活的能力都十分低浅和幼稚。但是，我上进心强，自信心同样强，思想单纯而健康，对新的事物敏感而又有激情；置身于大变革的群众生活之中，创作素材左右逢源、源源不断。所以，我犹如一个积极的新闻报道员，终日到处打听新人新事，随时随地碰上新人新事，就急不可待地写出来；写时力求跟政治形势配合，与社会现实一致；无顾忌，没包袱，写得既快又多。这些决定了我只能写短篇小说，短的才能够快写多写；快写多写才能够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，才“过瘾”，才可以得到满足。过了些时候，创作经验较多了，素材积累较丰富了，对生活的观察也较深沉了，因此，感到总用我熟悉了的短篇小说的形式，总写新人新事的东西，实在束手束脚。必须给自己树一个新的

追赶目标；写深刻地反映生活情景、历史地记录时代变迁的作品。这样的内容，短篇就不能容纳，“小长篇”和中篇也难以承担，必然得写长画卷。到了今天，也就是创作《嫁不出去的傻丫头》这组中篇小说的阶段，因为充当创作源泉的社会生活变化了，作品的读者变化了；做为作者的我，也不是五十年代写短篇小说的我，同样不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写多卷长篇小说的我，由于自身的新的经历和外界的变化而相应地起了变化。经过一个“反省过去、思考未来”的过程之后，我决计：立足农村这块基地上，写人，写人生。不再单纯地写新人新事，也不再沿用往时那种以政治运动和经济变革为“经”线、以人物的相应活动为“纬”线，来结构作品。这回倒过来，不论写中篇还是“小长篇”，贯穿着作品的主线都是“人”，写人的心灵辙印、人的命运轨道；政治、经济，即整个社会动态动向，只充当人的背景和天幕。在艺术表现上，我谨慎地吸收“洋”东西，用自己的炉灶锅铲炒我自己的拿手菜，以保持自己曾经赢得一些读者的特点。同时在两个方面花了些功夫，取得些变化：一是作品里所描述的事件线索尽量单纯；一是事件的节奏、人物的脚步尽量快速。这两方面的“追赶”，是造成我这几年多写中篇和“小长篇”的主要根由。例如《赵百万的人生片断》，如果不在主观上做上述的艺术表现方面的变化，它会以另一种样子的长篇小说出现在读者面前。

创作上的追赶，就是艺术上的探索，不免有成有败、有得有失。这次结集，只是再一次回顾的开始。作者恳切地希望听到批评指教。

作家在不断地为自己前程树立目标，继而追赶的时候，极少有“随意性”，必不可免地受着时代的局限和诱导。换句话说，作家的追赶，得随着时代前进而前进。正在写《艳阳天》前后的

我，不可能给自己树立起一个写批评“三面红旗”的《浮云》、《老人和树》的追赶目标；也不可能给自己树立起一个写抨击极左思潮的《山水情》的追赶目标。“大跃进”那会儿，我只认识到不应该昧着良心写亩产一万斤、不跟着搞浮夸、不帮助刮“共产风”，充其量写篇《半夜敲门》，表扬一位不搞浮夸、不欺下瞒上的基层干部。十年动乱期间，只是感到许多问题不对头，不跟着歌颂“造反夺权”而已，并没有认识到对那十年要彻底否定。这情形，起码对我来说，不是个胆量大小的问题，关键在于认识水平的高低不同所致。我的《浮云》、《老人和树》和《山水情》，是在整个社会来了个历史地回顾和反省，是在全党全民都开始觉悟，并开始了全面改革之后才诞生的。那时候，我跟京郊和冀东故乡的农民、基层干部一起，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，一点一点地提高了认识，同时酝酿起这几部作品。

时代是水，我是船；水涨船高，我随着时代的脚步而有所前进；除此而外，在认识我们自己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方面，我没有任何高明超人之处。

我承认时代的局限性，意识到自己无力完全突破这个局限。所以对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，只把过失当做教训，当做继续向前追赶的动力，从不后悔，更不因悔恨而沉沦。对已经公诸于世、成为社会之物的自己写的作品，保持有主见的虚心和冷静态度，不为它所遭受的褒贬所左右；尽量地自知自明、自信自强，别说糊涂话，不说献媚话，更不说假话。这样才有利于自己的“追赶”：明明白白、有气有力地往前追赶，不致因时代的变化而过久地困惑和徘徊，尤其能避免误入歧途！即便如牛一样笨一样慢和一样被人鄙视，但正如俗话所说的“笨人比懒人值钱，懒人比小人（恶人、坏人、走歪门邪道的人）值钱”；还有“不怕慢，就怕

站，不站快十慢”。

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傲视别人，都不认为比谁都高大；同样的，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肯心甘情愿地挨欺受气，不觉得比谁矮一头、低一等。我知道我的存在价值。此时借题发挥，将自己比作“牛”，也非故意自谦、装模做样和哗众取宠。我的为人和我的作品一样，一律是真的。尽管这样的真，有时会显出某种狭隘、固执、偏颇和谬误。然而，这正是本来的我，是我的庐山真面目，是我身上的真毛病的反映。假如在我还没有克服掉这些缺憾、没有医治好这些毛病之时，却以另外一副面孔站在朋友和读者面前，那就是伪装和虚假了，那是可恶可悲的！

要知道：真的碎铜烂铁，比冒充金银的铜条铁锭可爱得多，它不骗人、不害人。

现在又有人热心肠地探讨起“文如其人”这句至理名言的正与误了。我是信笃这个“理”的愚人。所以听到这个信息之后，就好似听他们正在推测拦路强奸者，是否怀着对被害者的崇高爱情，砸银行的抢劫犯，是否惦着回去周济照顾村子里的“五保户”和再往抢来的钱包里搭上点儿，去购买国库券一样的新奇、可笑。当然，我这是象傻丫头那样傻想、傻笑，只能引人发笑而已。

退一步说吧，不论什么样的“人”，为什么样的“文”，我都诚恳地希望，作家们多来点儿真的，少来点儿假的，当真正的人，写真实的作品。

一位象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艰难地走进了文学大门的青年，在文学界里兜了个圈子，又悔又恨地跟我披露一些令人听了瞠目结舌的奇闻、丑闻。他的结论，用一句话可以概括：文学这个殿堂并不神圣。我对他说：社会主义的文学殿堂本来是神圣

的……事在人为，从我们每一个文学工作者自己“为”起，特别是青年一代，一齐当革命人，写革命文，让文学殿堂真正地神圣起来。

我自己呢？我自己正以上述这些话为律为戒，照着一九八四年三月《文艺报》和《人民文学》在涿县召开的农村小说题材座谈会上，我做表态发言时所公布的那个目标，追赶，追赶，追赶！

浩 然

一九八四年十月八日于通州镇

目 录

追赶者的几句话.....	1
赵百万的人生片断.....	1
细雨濛濛	83
能人楚世杰	134
嫁不出去的傻丫头.....	196
姑娘大了要出嫁.....	250
老人和树	359
浮 云	452

赵百万的人生片断

我当过农民，我热爱农民，所以我对农民知心；
农民形形色色；农民就是农民。

——摘自我的日记本

—

要给赵百万写个传，可实在太难；就算简单点儿，弄个小传，也极不容易；我只好图方便、抄近道儿，记下他一生的几个片断。

他是汉族，家住蓟县盘山西边的大北坡。

他中等偏高的个儿，油黑的皮肤；黑脸、黑胳膊、黑腿，除了一对眼白和满嘴的牙齿，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黑的；所以衬托得眼睛特别明亮、牙齿格外洁白。

到如今他六十岁刚出头。从那份心气儿看，从那副身子骨儿估摸，他离着到苏庄子火葬场去，起码还得二十年！

光摆摆以往的六十多个春夏秋冬，他那出身历史就够五花八门的了。用我们过去习惯的话来说，那叫“复杂”！如果把他曾经参加的活动、担任的职务、充当的人类社会的种种角色，都排列出来的话，那么，印成铅字儿，也得占大辞典的两页半。

他当过八路军。他打过蒋介石。他挂过花、立过功。他当过多年大队干部。他出席过县劳模会。……他还搞过破鞋，蹲

过大狱，被开除过党籍……而且，他头顶上的红帽子和白帽子，来回倒替地变幻，闹得谁也说不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！

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
说一千，道一万，万变不离其宗；赵百万归根到底是个农民！

真的，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

他是蓟县三十万农民里边的一个。

他是中国八亿农民当中的一个！

二

他爸爸给他娶媳妇的那当儿，中国还没有八亿农民。当时人们的口头语是“四万万同胞”。

四万万人的一个大国家，竟让一个小小的日本给占据了！

“赵百万，快当兵去吧！……”身穿蓝色细布大衫的鲍老师，带着学生刷写完爱国抗日的标语，一边往回走，一边高唱爱国抗日的歌子，高呼爱国抗日的口号；发现站在路边看热闹的赵百万，激动而诚恳地鼓动起来，“快当兵去吧，赵百万！……”

“您老师可真会说笑话儿！”赵百万先被这意外的言辞吓了一跳，随即开口回答，“好铁不打钉，好人不当兵。我凭啥干那号没出息的事儿？”

鲍老师继续着自己的宣传：“好男儿得誓死保卫国家。咱中国要灭亡了！”

赵百万嘿嘿地一笑：“您可真会吓唬人。天没塌，地没陷，全是好端端的，咋会灭亡呢？”

“日本人都占领了邦均镇，你都没听说吗？啊！”

“唉，兵荒马乱，跟闹蝗虫，跟刮大风一个样儿；别看凶，一阵

儿就过去，庄稼人该咋过日子还得咋过日子。”

鲍老师对自己的一番好心获得这样一种效果，十分的惊讶和恼丧，可又没别的办法，就忍不住怒怨地说：“你们这些农民，实在麻木！实在麻木哟！”

赵百万身强力壮，胳膊腿脚都十分灵活，咋会麻木呢？看他转身离开发愣的鲍老师，往家走的时候，抓着长长木杆儿的手多么厚大！两条腿多么“溜索”！两只脚“叭哒、叭哒”的，多么有劲儿！迈进排子门呼喊的时候，他的嗓门多高、声音多洪亮：

“喂，饭熟了吗？”

身上穿着红棉袄绿棉裤，脸上搽着扑粉、点着胭脂的新媳妇，应声出现在草房屋的门口。她用羞羞答答的、掩饰着喜悦和深情的目光，迎着男人穿过小院，走进屋里。

玉米面贴饼子，杂面割豆汤，老腌咸菜，大葱蘸酱，真香真甜，真对胃口！

赵百万往小地桌跟前一蹲，迫不及待地动了手：猛吞猛咽，好似风扫残云，转眼就让他给吃个盆干碗净。

头晌的活儿没做完，撂个半茬儿；既没有觉着累，也没有丝毫困倦的意思，用不着歇晌睡觉。他放下碗筷，抄起木杆儿，一边打着饱嗝儿，一边朝外走去。又象午前那样，他拐出村口，拐到正北的山坡下，拐进自己家的小果树园子里，接续着给树行间的白薯翻蔓儿。

这儿都是依就小山包的漫漫小坡，开拓垒砌的梯田，一条一条的，向左右弯曲着，朝上方重叠着。不过，从远处向这边观望，既看不到地块，也看不到坝台，全让一棵挨一棵、一片连一片的苍郁茂密的树冠给遮住了。只有临到跟前时才能瞧清楚：地中间是柿子树，地阶上是红枣树。正是农历七月初，万物

争荣竞长的季节。发个儿的大柿子压弯了枝儿，上颜色的大枣儿红了圈儿；果实没熟，先溢出一股子扑脸呛鼻子的香气。

赵家的果园面积不大，株数也不众多，只有二十多棵柿子树，两行半枣树。别看少，能养人。养活了好几辈人。据说，这地是赵百万爷爷的爷爷开的；这树是赵百万的爷爷栽的。赵百万的爸爸把地养得挺肥，把树伺候得挺壮，每一年不是收柿子就收枣儿，让主人能够卖了果子换成粮食，贴补着家口不饿肚子，不挖债窟窿，不败家逃荒。守本分、有出息的爸爸，靠这土地和树木，翻修了草房屋，给儿子娶了媳妇；寿终正寝之后，又把完好无损的土地和树木，传给了儿子赵百万。

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大北坡，老少光棍汉可不少；如果把他们集合在一块儿，能成立一个连。有趣的是，凡是在村后边有果树园子的人家，哪怕有很小的地盘、很少几棵树木，都没有熬光棍儿的男子，都不会断子绝孙。由此可见，这珍贵的土地和果树，实在是大北坡农民的命根子！

赵百万在炎炎的烈日下，不停地操作。他那赤裸着油黑油黑的臂膀上，流着汗水，就象铁锅里滚动着油珠儿。他两只大手攥着木杆儿，把长长的白薯秧蔓挑起，甩开，翻过来。他要不惜力气地把地养好，把树养好；过一年，把小牛换成大牛；再过一年，把房顶的山柴草换成瓦；等手头富裕的时候，把旧被子换上新棉花，好暖暖和和地过冬天。

他想到这儿，十分惬意地直起腰，抹一把汗。他几乎是不禁不由地抬起眼睛，立刻看到山坡下的村庄，看到村东头的草房屋顶，看到小院子，看到新媳妇正站在院门口喂鸡。他的心，立刻如同抹了蜜！

三

那一天清早，“哐哐”的锣声，把他从抹了蜜一样的酣睡美梦中惊醒。

他赶紧把枕在媳妇头下的胳膊抽出来，坐起身子，伸着耳朵细听。

“哐哐！哐哐哐！”

锣声从远而近。同时听到伴随着类似破锣的粗哑发闷的嗓门儿：

“乡亲们听了！十八岁以上的男人，吃罢早饭，带上铁镐，到西头大庙集齐儿，一个也不准落下！故意落下的定罚不赦！……”

媳妇也醒过来，揉着眼睛问：“这是什么人呼喊哪？”

“会头。姓欧，外号破锣。浑身是懒筋，穷得叮当响，到处混吃混喝，靠公会的残汤剩饭养活家口——没脸着哪！”

“他让男人们集齐儿干啥？”

“准是又操练呗。闲着没事儿瞎折腾。”

“那就别去。”

“不行。一点卯缺我，还不挨剋？那老家伙头顶上长疮，脚后跟流脓——坏到底儿啦！他啥屎都拉，就是不拉人屎，犯到他手里还得了！”

媳妇一听事情严重，赶紧起来做饭，好不耽误男人集齐儿去。

赵百万没顾吃饱肚子，就放下碗筷，急匆匆忙地奔向西头大庙。

古老的庙宇，已经多年失修。断了墙头，坏了窗户，七错八

落的瓦垅里，长着很茁壮的野草，弯垂着大穗子。山门前有一块空场子。那儿蹲着坐着好多刚刚奔来的成年男人，全都是一副疑惑不安的神色，全都小心警觉地等待着什么，全都不吭声。有些看热闹的小孩子和带着探听神态的女人，站在远远的残墙边上。最热闹而又阴森森的地方是山门对面的一座石头垒的戏台上，那儿有一伙身穿黄服、头戴钢盔、手持长枪的日本兵。他们威风凛凛地列着队，虎视眈眈地盯着戏台下的中国农民。有三个站在队列外边的人，一个是小胖子、乍腮帮的日本兵小队长；一个是干瘦子、眯缝眼的翻译官；一个是高个头、水蛇腰、咧着大嘴岔的会头“破锣”。

破锣冲着日本小队长点头哈腰地说些什么，又点头哈腰地答应了什么；随后扯开了破锣一样的嗓子，冲着台下大喊大叫：

“都给我往前凑凑！都给我仔细地听着，听皇军大人的训话！”

日本小队长倒背着双手，腆着胖肚子，仰着小脑袋，两只圆溜溜的绿豆眼望着中国的天空，“哇哩哇啦”地一通叫唤。

翻译官一句一句地给翻译着。他翻译的话，跟没翻译的原话同样难懂。

台下的农民们只听清楚这样一句：

“大皇军为着百姓良民过平安日子，推行强化治安，要在北山根挖一条壕沟，拦住山里的土八路到大道沿线和平原城镇骚扰。大北坡地段迎着一个出山的川口，十分重要，一定要早日把壕沟修起来、修好，……”

破锣得到鸡毛令箭，朝众吆喝：“马上动土开工，跟我来！到地盘再点名分段儿！”

鸦雀无声的农民们，突然象出栏的羊群一般，一个跟着一个